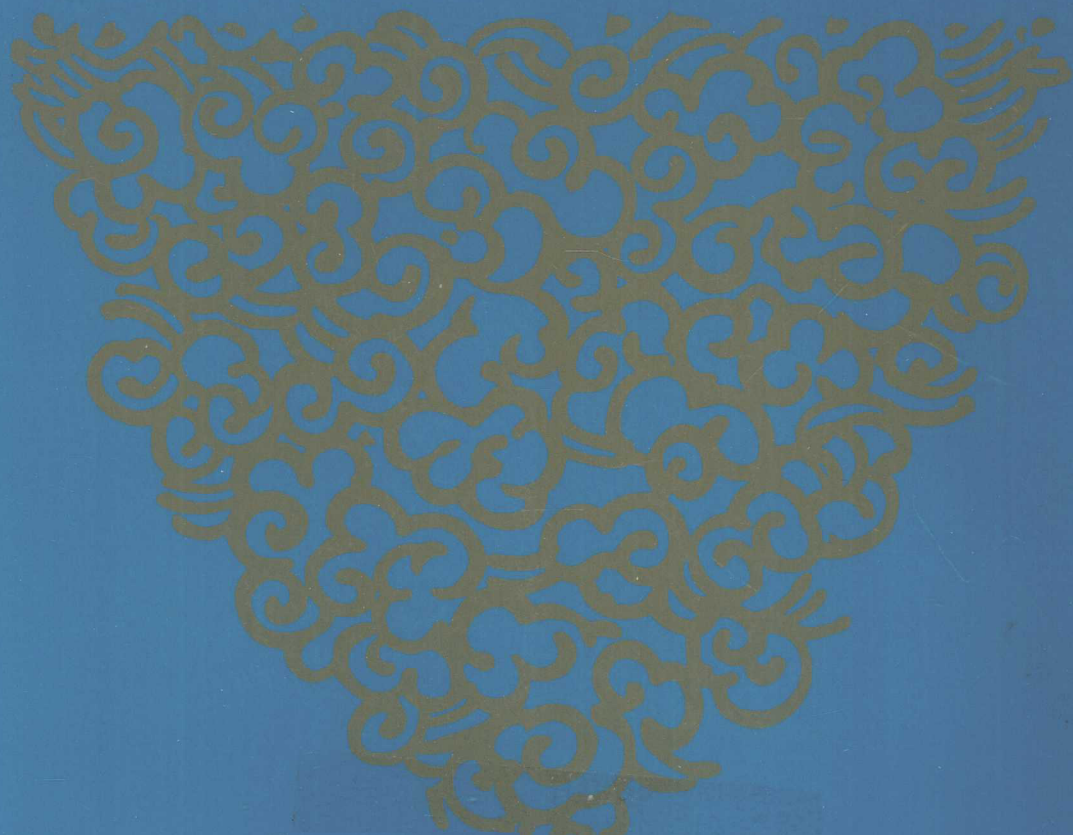




論衡讀本

新譯

三民書局印行 / 古籍今注新譯叢書 / 哲學類 / 注譯 / 校閱 / 楚鎮幣 / 五鳳周

蔡鎮楚
周鳳五

注譯
校閱

新 譯

論
衡
讀
本
(上)

三民書局
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新譯論衡讀本 / 蔡鎮楚注譯; 周鳳五校閱. — 二版一刷. — 臺北市: 三民, 2009
冊; 公分. — (古籍今注新譯叢書)

ISBN 978-957-14-5202-9 (上冊: 平裝)

ISBN 978-957-14-5203-6 (下冊: 平裝)

1. 論衡 2. 注釋

122.61

98010112

◎ 新譯論衡讀本(上)

注譯者 蔡鎮楚

校閱者 周鳳五

發行人 劉振強

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
電話 (02)25006600

郵撥帳號 0009998-5

門市部 (復北店)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
(重南店)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
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1997年10月

二版一刷 2009年7月

編號 S 031320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
有著作權不准侵害

ISBN 978-957-14-5202-9 (上冊: 平裝)

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 三民網路書店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

劉振強

人類歷史發展，每至偏執一端，往而不返的關頭，總有一股新興的反本運動繼起，要求回顧過往的源頭，從中汲取新生的創造力量。孔子所謂的述而不作，溫故知新，以及西方文藝復興所強調的再生精神，都體現了創造源頭這股日新不竭的力量。古典之所以重要，古籍之所以不可不讀，正在這層尋本與啟示的意義上。處於現代世界而倡言讀古書，並不是迷信傳統，更不是故步自封；而是當我們愈懂得聆聽來自根源的聲音，我們就愈懂得如何向歷史追問，也就愈能夠清醒正對當世的苦厄。要擴大心量，冥契古今心靈，會通宇宙精神，不能不由學會讀古書這一層根本的工夫做起。

基於這樣的想法，本局自草創以來，即懷著注譯傳統重要典籍的理想，由第一部的四書做起，希望藉由文字障礙的掃除，幫助有心的讀者，打開禁錮於古老話語中的豐沛寶藏。我們工作的原則是「兼取諸家，直注明解」。一方面熔鑄眾說，擇善而從；一方面也力求明白可喻，達到學術普及化的要求。叢書自陸續出刊以來，頗受各界的喜愛，使我們得到很大的鼓勵，也有信心繼續推

廣這項工作。隨著海峽兩岸的交流，我們注譯的成員，也由臺灣各大學的教授，擴及大陸各有專長的學者。陣容的充實，使我們有更多的資源，整理更多樣化的古籍。兼採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的要典，重拾對通才器識的重視，將是我們進一步工作的目標。

古籍的注譯，固然是一件繁難的工作，但其實也只是整個工作的開端而已，最後的完成與意義的賦予，全賴讀者的閱讀與自得自證。我們期望這項工作能有助於為世界文化的未來匯流，注入一股源頭活水；也希望各界博雅君子不吝指正，讓我們的步伐能夠更堅穩地走下去。

導讀

《論衡》是一部難讀的書。這並非因為它文字艱深，難以卒讀——恰恰相反，《論衡》一書，平易淺近，明白如話，連王充自己也承認它「形露易觀」，以致引起時人非議（《自紀篇》）——而是因為《論衡》是一部重要的學術著作，作者的筆觸涉及到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許多領域。其內容之廣博，思想之宏深，體制之龐大，在先秦兩漢諸子中並不多見，若浮光掠影，或淺嘗輒止，則很難把握其中真諦。此次著述，我逐字逐句地研讀再三，倍感此書之恢宏博大。現在奉獻於讀者面前的，僅僅是鄙人研讀《論衡》的點滴心得而已。名為「導讀」，實乃引玉之磚也。

一

《論衡》的作者王充，是東漢初年一位著名的學者。王充在世時，同郡謝夷吾上書漢章帝，稱「充之天才，非學所加，雖前世孟軻、孫卿，近世揚雄、劉向、司馬遷，不能過也。」（謝承《後漢書》）雖為溢美、引薦之辭，但王充在兩漢學術史上與揚雄、劉向、司馬遷、桓譚並列的地位，則一直為千年學苑所肯定，以致古往今來的中國哲學史、思想史、美學史、文學史、文學理論批評史，乃至中國通史、文化史等，都無法迴避他的歷史地位。

王充，字仲任，東漢會稽郡上虞縣（今屬浙江省）人。生於漢光武帝建武三年（西元二七年），約卒於漢和帝永元九年（西元九七年），終年七十歲左右。王充出身於「細族孤門」，據《自紀篇》和《後漢書》本傳載，祖籍魏郡元城（今河北大名），先世以軍功封會稽陽亭，後來因變亂而失爵，遂在封地落戶。祖父王汎遷居會稽，至父親王誦居住錢塘（今杭州）以賈販為業，因與豪門丁伯等結怨，舉家遷

居上虞。王充自幼聰明好學，後到京城，入太學，拜扶風班彪為師。家貧無書，常遊於洛陽書市，所閱之書，過目能誦，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。隨後屏居家鄉教書，亦曾任當地縣、郡功曹及州府從事，因與長官意見不合，於是辭官回家，閉門潛思，絕慶弔之禮，著書立說。漢章帝元和三年（西元八十六年）起，先後攜家於丹陽、九江、廬江郡任屬官，後被揚州刺史董勤辟為從事，轉遷治中。章帝章和二年（西元八十八年）「罷州家居」，繼而續書。同郡友人謝夷吾慕其才學，上書引薦王充，漢章帝亦「特詔公車徵」之，王充託病不行。晚年窮困潦倒，處境相當悲涼。永元中，病卒於家。

王充出身細族孤門，而祖、父任俠使氣，勇勢凌人，家風慄悍。受其影響，王充為人清高，矜莊寂寥，好傑友雅徒。從小有巨人之志，才高而不尚苟作，口辯而不好談對，不是與自己意氣相投的人，他整天可以不說話。出仕之後，他不喜歡沽名釣譽，不為個人利益去拜見長官。從不炫耀自己，眾人聚會在一起，不問則不言；晉見上司，不問則不答，努力把修養德行作為自己為人處世的根本，而羞於依靠才能去追求個人名利。在縣、郡、州擔任功曹、從事、治中期間，他尊重人才，常言人之長，少說人之短，專門引薦未做官的讀書人，為已做官的人才開脫過錯。對於自己不滿意的人，也不去稱贊他，有過錯時，也不去落井下石，「能釋人之大過，亦悲夫人之細非」（《自紀篇》）。這就是王充為人處世的準則，也是王充作為人事幹部最可貴的品質。他心性澹泊，不慕富貴，「在鄉里慕遽伯玉之節，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。見污傷不肯自明，位不進亦不懷恨。貧無一畝庇身，志佚於王公；賤無斗石之秩，意若食萬鍾。得官不欣，失位不恨。處逸樂而欲不放，居貧苦而志不倦」，只求「處卑與尊齊操，位賤與貴比德」即可矣（《自紀篇》）。這固然是一些自我安慰、自我解脫的話，但也道出了王充的人生哲學。他說：「憂德之不豐，不患爵之不尊；恥名之太白，不惡位之不遷。垂棘與瓦同價，明月與礫同囊，苟有二寶之質，不害為世所同。世能知善，雖賤猶顯；不能別白，雖尊猶辱。」心地磊落，志行高潔，但字裡行間，亦流露出懷才不遇之情。

王充一生，著述甚豐，有《譏俗節義》、《政務》、《論衡》、《養性》等。現存《論衡》三十卷，八十五篇（其中〈招致篇〉有目無文，實存八十四篇），凡二十餘萬言。其餘三書已佚。

二

何謂《論衡》？王充自己解釋說：「《論衡》者，論之平也。」（〈自紀篇〉）《書·舜典》：「同律度量衡。」偽孔傳云：「衡，秤也。」《漢書·律曆志》：「衡，平也，所以任權而均物，平輕重也。」由此可見，「平」即「衡」，秤也，引申而為衡量標準。「論衡」者，論之衡，或論之平也。王充以此為書名，意在衡量言論是非真偽之標準。其內涵十分深刻。

王充曾以〈對作篇〉來闡述《論衡》一書的寫作緣起、目的和動機。他說：

是故《論衡》之造也，起眾書並失實，虛妄之言勝真美也。

故《論衡》者，所以銓輕重之言，立真偽之平，非苟調文飾辭，為奇偉之觀也。其本皆起人間有非，故盡思極心，以譏世俗。

孟子曰：「予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！」今吾不得已也！虛妄顯於真，實誠亂於偽，世人不悟，是非不定，紫朱雜側，瓦玉集糅，以情言之，豈吾心所能忍哉！

「虛妄顯於真，實誠亂於偽」，以至於「虛妄之言勝真美」者，乃是漢代社會普遍存在的弊病，聞見之者莫不感到痛心。一種「閔世憂俗」的社會責任感和科學精神，使王充「心漬湧，筆手擾」，「不得已，故為《論衡》」（〈對作篇〉）。王充指出，《論衡》的寫作目的，在於通過「解釋世俗之疑，辯照是非之理」，而「冀悟迷惑之心，使知虛實之分」（〈對作篇〉），以「沒華虛之文，存敦龐之樸，撥流失之風，反宓戲

之俗」(《自紀篇》)。

《論衡》是一部「不得已」而為之的憤世嫉俗之作。其寫作宗旨，就是王充《佚文篇》所說：

「《詩三百》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無邪。」《論衡》篇以十數，亦一言也，曰：「疾虛妄。」

疾，惡也。厭惡、憎惡、反對之意。虛妄，虛假不實。疾虛妄，就是反對虛假不實之辭。王充以「疾虛妄」三個字來高度概括《論衡》的宗旨，鞭辟入裡，切中時弊。

在中國五千年學術發展史上，大凡每一部鴻篇巨製的學術專著，應該是那個特定的歷史階段的學術思想和著作者個人才華的合璧。一部《論衡》，凡三十卷八十五篇，洋洋二十萬字，乃是王充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政治、哲學、文學、社會風尚所體現的理性思想與王充睿智深邃的學識、膽略、才華相結合的產物。

漢代是一個英雄的時代，它以其恢宏雄渾的氣魄、千古卓絕的業績，巍巍然矗立於中國歷史的長河之中。殊途同歸，百川匯海，受時代潮流之趨，漢代哲學以其雄渾的氣魄和闊大的模式，融先秦諸子百家之說於一爐，建立了一個適應於鞏固大一統的皇權之需、符合中國宗法社會和民族文化性格的新的思想體系：天人體系。這個體系的核心，便是「人」。在漢人思想中，人是天地的寧馨兒，是天之驕子，是真、善、美的完滿的統一。人之為「真」，因為它有智慧，能知天，認識自然，是真理和知識的主宰者；人之為「善」，因為它有道德，明詩書，知禮義，懂人倫；人之為「美」，因為它由天地中和之氣而生，而「中和」乃是美的最本質的特徵。人在宇宙中的突出地位，所反映的正是漢代哲學的根本特徵和時代風貌。著名思想家董仲舒說：「天、地、陰、陽、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九，與人而十者，天之數畢也。」(《春秋繁露·天地陰陽》)這「天」，就是宇宙，包涵萬物，廣袤無極，是萬物之祖。又說：「天

地之氣，合而為一，分為陰陽，判為四時，列為五行。」（同上〈五行相生〉）漢人的哲學大廈，建築在陰陽五行說的基礎之上。陰陽調和，五行相生，天人合一，天人相與，人神不分。漢人以「陰陽五行」為思維模式，對一切社會現象進行推演、運算，引出現實性的政治結論，這就使漢代哲學蒙上了一層富有時代特色的神秘色彩，決定了哲學社會科學作為神權——王權附庸之物的特質。

整個漢代，前後四百多年輝煌歷程，牢籠整個社會的一是經學，二是神學。所謂「經學」，就是訓解或闡述儒家經典之學。漢代的經學，由於有今古文之爭，而一分为二，即有「今文經學」和「古文經學」兩大派別。今文經，以漢代通行的隸書記錄而成。如《書》出於伏生，《禮》出於高堂生，《春秋公羊傳》出於公羊氏和胡毋生。漢武帝採納董仲舒、公孫弘的建議，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，設立五經博士，確立了今文經學唯我獨尊的官方學術和政治指導思想地位，從此經學成為鞏固皇權的工具，直接影響和支配著漢代政權和社會政治命運的巨大力量。古文經，是指秦以前用古文書寫而由漢儒訓釋的儒家經典。相傳為漢武帝末期因魯共王劉餘拆毀孔子教授堂時得之於壁中，故又名「壁中書」。今文經學盛於西漢，強調「師法」、「家法」，追求「微言大義」，主天人相與之學，重陰陽災異之說。根據董仲舒「名號以達天意」的理論，儒家經典特別是《春秋公羊傳》的字字句句，都是聖人表達天意的符號。這樣一來，漢代的經學哲學便與神學合流，使經學神學化，導致了今文經學哲學的衰亡。其主要表現有以下三點：一是神化聖王和孔子，給皇權塗飾一層神聖的光環，以適應大一統政治局面的需要；二是神化儒家經典，使經學研究日趨官僚化、神秘化、教條化，排斥異端邪說，以維護唯我獨尊的漢代儒學的權威；三是神化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，不僅任何問題都以陰陽五行的思維模式去解答，而且因襲原始神話和巫術，把經歷著一個哲學化過程的神話資料裝配到宗教神學的建構之中去，使遠古蒙昧表現出一種新的形態，加強其影響社會的力度，使之與識緯神學接軌。所以，從學術上來說，以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為標誌，經學神學的確立，就宣告今文經學作為學術和哲學的生命之樹的枯萎，而識緯之學的氾濫和古

文經學的崛起，乃是勢所必然。

兩漢之際，儒生與方士混合，成為一代風氣。哀平之世，讖緯之學氾濫，大有取代今文經學的一統天下之勢。讖，是巫師、方士製作的隱語或預言，作為吉凶的符驗或徵兆。《後漢書·光武帝紀》注云：「讖，符命之書。讖，驗也；言為王者受命之徵驗也。」《釋名·釋典藝》：「讖，織也；其義纖微而有效驗也。」《四庫提要》云：「讖者，詭為隱語，預決吉凶。」這都是廣義的解釋；狹義的是指所謂「河圖」、「洛書」而言。《文選·思立賦》注引《蒼頡》：「讖書，河洛書也。」故有「圖讖」之名。緯，對「經」而言，是對經書的解說。漢儒治經，多撰緯書，據王應麟的《困學紀聞》等載，漢代緯書多達三十五種，其中《易》緯六，《書》緯五，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緯各三，《春秋》緯十三，《孝經》緯二。緯的特點，是以神學解釋經書，並且把這種解釋託名於孔子。既神化經書，又神化孔子。中元元年，光武宣布「圖讖於天下」，使讖緯成了國憲，享有神聖至尊的地位。讖緯之學是今文經學神學化的產物，而讖緯氾濫，更加速了經學的神學化。

東漢初年，讖緯之學、今文經學、古文經學三足鼎立。為統一學術思想，重振經學權威，漢章帝建初四年（西元七九年）召開了白虎觀會議。這是漢代哲學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，會議的學術成果就是班固寫的會議綜述《白虎通義》。全書以陰陽五行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基礎，對四十三條名詞術語予以解釋和說明。由於皇帝親臨裁決而成為一部經學法典式學術名詞彙編。

漢代，是中國歷史上國威遠被的輝煌帝國，也是一個被經學神學的濃重陰影籠罩著的神秘王國。在以陰陽五行、天人感應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為基石而建造的帝國大廈之中，皇權的神化，儒學的神化，神話傳說的神化，形成了漢代社會中天國、人間、地獄聯成一片以及神話、歷史、現實交匯融合的時代特點。受讖緯神學思想的鉗制，漢人所追求的，乃是皇權之尊，天人之與，厚葬之祭，虛妄之美，神靈之祐。這就是王充所生活的時代，這就是《論衡》一書問世之際的時代風貌。這是一個蓬勃向上的時代，

以宏闊豪壯的氣勢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文化的繁榮，造就了一代名垂青史的帝王將相和偉大的哲學家、文學家、科學家、史學家和學者，國威顯赫，功業卓著，中華民族賴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；但同時這又是一個蒙昧黑暗的哲學時代，天地山川神祇之祀、驕奢淫靡之習、神仙羽化之俗、虛妄怪誕之文，風靡整個社會。誠然如此，但是哲學作為人類智慧的結晶，理性思辨精神的昇華，是不可能長期沈淪於神學的牛溲馬勃之中的。即使在天人感應、讖緯神學甚囂塵上之際，人類理智的清醒的光輝在漢人心靈深處也並沒有熄滅，許多思想家能會通古今之學，博採百家之長，經過創造思辨，創立了自己的哲學體系。特別是偉大的思想家王充，作為讖緯神學的偉大批判者，他高舉「疾虛妄」的旗幟，以《論衡》為標誌，完成了對讖緯神學的思想批判。在中國哲學史上，其理論價值和歷史意義，無異於一次「壯麗的日出」（黑格爾語）。

三

《論衡》一書的撰寫，歷時三十餘年，浸透了王充畢生的精力和心血。這部巨著博大宏深，涵蓋完闊，涉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很多學術領域，諸如天文學、氣象學、醫學、地理學、病理學、心理學、神學、社會學、災害學、倫理學、民俗學、史學、禮學、神話學、人類學、民族學、哲學、政治學、人才學、教育學、文藝學、美學、文藝心理學、語言學、邏輯學、文獻學、書評文化學以及生命科學等，不啻是漢代學術發展史上一部集大成之作。從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角度，全面審視這部巨著，其理論體系之構成大致包括以下幾個學術觀點：自然論，性命論，社會論，無神論，知識論，人才論，文章論等，構成了王充「疾虛妄」的思想體系，而體系之建立又是以其哲學思想為理論基礎的。

（一）自然論

王充是一位哲學家，他的《論衡》一書，以「元氣自然論」為邏輯起點，來構建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。

所謂「元氣」，其一是指產生和構成人與天地萬物的物質元素。其二是陰陽二氣渾沌未開的物質實體。天是自然物質，還是天神上帝？這是漢代思想界爭論的焦點。漢儒說「天，氣也，故其去人不遠，人有是非，陰為德害，天輒知之，又輒應之」。認為天是有意志、主賞罰的天神上帝。王充反對把天神秘化，他說：

如實論之，天，體；非氣也。人生於天，何嫌天無氣？猶有體在上，與人相遠。（《談天篇》）
含氣之類，無有不長。天地，含氣之自然也。（《談天篇》）

王充認為，天地是物質實體，是一種客觀存在，不是有意志、主賞罰的天神上帝。其《說日篇》更圍繞著太陽運行諸問題同漢儒反科學之論展開論爭，比較集中地反映了王充的宇宙觀念。他說：

天之行也，施氣自然。施氣則物自生，非故施氣以生物也。
日月五星之行，皆施氣焉。

王充認為，天體和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不止，是因為它們作為物質實體在自然施氣的緣故，是沒有目的，沒有意識的。又說：「夫日者，天之火也，與地之火無以異也。」認為太陽是一團烈火，駁斥了太陽中有「三足烏鴉」的說法。而日蝕與月蝕一樣，是由於太陽、月亮在一定的週期內「光自損」而產生的，是「氣自然」造成的。他認為雲、雨的出現，是自然之道。指出：

雲霧，雨之微也，夏則為露，冬則為霜，溫則為雨，寒則為雪。雨露凍凝者，皆由地發，不從天降也。

王充不是科學家，只能以感性體驗和邏輯推理去認識宇宙，所以尚落後於漢代的天文科學，但他強調天地日月星辰的客觀實在性，主要在於批評神秘化的天人感應論。

王充哲學思想以元氣自然論為核心，認為天地間的一切，如天上的日月星辰，地上的人和萬物，都是由元氣（即氣）構成的，「物隨氣變」（《講瑞篇》），各種物類之別，是由於稟承的元氣不同所致。基於這種認識，他認為「人稟元氣於天」（《無形篇》），人胚胎於母體時承受「氣」而形成生命。「形、氣、性，天也」（同上），認為人的形體、氣和生命，都是由天施氣決定的。在《辨崇篇》中，他說：

人，物也，萬物之中有智慧者也。其受命於天，稟氣於元，與物無異。

王充認為人同萬物一樣，都是由氣構成的，所不同者在於人是有智慧的。人的智慧來源於精氣，他說：

夫人所以生者，陰、陽氣也。陰氣主為骨肉，陽氣主為精神。人之生也，陰、陽氣具，故骨肉堅，精氣盛；精氣為知，骨肉為強，故精神言談，形體固守。（《訂鬼篇》）

所謂「精氣」，又名「元精」（《超奇篇》），是元氣中最精微的部分，物質屬性與一般元氣相同。王充把構成人和萬物的「氣」分為陰氣和陽氣，陰氣構成人的形體（骨肉），陽氣構成人的精神，所以「精氣」就是「陽氣」。有時又稱之為「神氣」（《論死篇》）。王充認為，陽氣導致人和萬物的生長，使之獲得生命，《論死篇》說「陽氣導物而生，故謂之神」，又說「人用神氣生，其死復歸神氣」，認為精氣在自然

界是無知的，構成人的精神後才是有知的，人死後又回歸到自然界中，如此循環往復。所以他說：「能為精氣者，血脈也。」又說：「人之所以聰明智慧者，以含五常之氣也；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，以五藏在形中也。」（《論死篇》）這些論述都說明精氣必須依賴形體而後才能變成人的知覺，精神不能離開人的形體而存在，從而正確地處理了形、神關係。

王充《論衡》所建構的元氣自然論哲學體系，具有一個明顯的特點，就是哲學與自然科學的相互影響和滲透，一方面以元氣構成論來分析宇宙中人和萬物的產生和構成，一方面又以自然論去解釋世間所出現的許多物理現象、生理現象和心理現象，使其哲學體系具有自然科學的某些特徵。

目的、自然，必然、偶然，是一直支配人類哲學思想的重大問題，被人稱之為「斯芬克斯之謎」。王充繼承了黃老學派「道法自然」、「天道無為」的自然觀念，以反對董仲舒所建立的神學目的論思想體系。從《自然篇》、《譴告篇》、《感類篇》、《感虛篇》、《變動篇》、《異虛篇》、《龍虛篇》、《雷虛篇》、《寒溫篇》、《變動篇》、《招致篇》、《明零篇》、《亂龍篇》等看來，王充哲學主「天道自然無為」之論。他指出：

夫天道，自然也，無為。如譴告人，是有為，非自然也。黃老之家，論說天道，得其實矣。（《譴告篇》）

王充認為，天是自然無為的實體，天的活動既無意識，亦無目的。「寒溫，天地節氣，非人所為」（《寒溫篇》），而「春溫夏暑，秋涼冬寒」，這是四季自然變化所致。「人、物繫於天，天為人、物主也」（《變動篇》），自然的變化可以影響於人和物，但「人不能動地，而亦不能動天」，因為「寒暑有節，不為人變改也」（同上），說明天氣的變化，自然災害的出現，是自然現象，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。

漢代儒學神學目的論說「天故生人」又「故生萬物」，王充批評說：

儒者論曰：「天地故生人。」此言妄也。夫天地合氣，人偶自生也，猶夫婦合氣，子則自生也。（《物勢篇》）

這就是說，天地不能有意識地創造人，人是天地之氣相互交合的產物，如同夫婦交合，陰氣與陽氣互相結合而生孩子一樣。天不能有意識地生人，也不能生物。所以王充又說：

夫天不能故生人，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。天地合氣，物偶自生矣。夫耕耘播種，故為之也，及其成與不熟，偶自然也。（同上）

王充認為，人和萬物不是天有意識地生成的，而是天地星宿在運行中施放出的「恬淡無欲，無為無事」（《自然篇》）的「自然之氣」（《初稟篇》）自然形成的，「天地合氣，萬物自生」（《自然篇》）。他進而指出：

天之動行也，施氣也；體動氣乃出，物乃生矣。由人動氣也，體動氣乃出，子亦生也。夫人之施氣也，非欲以生子，氣施而子自生矣。天動不欲以生物，而物自生，此則自然也；施氣不欲為物，而物自為，此則無為也。（《自然篇》）

導 天運動不是有意識去產生萬物，而萬物卻自己產生出來了，這就是「自然」；天施氣不是想要創造萬物，而萬物稟受了自然之氣卻自己形成了，這就是「無為」。所以，王充的自然無為思想，綜上所述，包含有三個主要含義：一是自然界的物質性、客觀性；二是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必然性；三是元氣運動

的自發性，認為事物的發展演變的源泉和動力在於元氣自身，而不在於外力的作用。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漢代神學目的論思想體系。

(二) 性命論

性命論，是中國哲學思想體系中一個重大命題。它包括人性之善惡和命之吉凶兩個方面的內涵。王充的性命論，建立在元氣自然論之哲學基礎上。

關於人性之論，孟子主性善論，荀子主性惡論，告子主性無善惡論，揚雄主性善惡混論，王充則主性有善有惡論。在《論衡》之《本性篇》中，王充全面分析了從周人世碩、孟子到漢人劉向以來的各種人性論，認為只有世子、公孫尼子的性有善有惡論是正確的。他說：

實者人性有善有惡，猶人才有高有下也。高不可下，下不可高。謂性無善惡，是謂人才無高下也。稟性受命，同一實也。命有貴賤，性有善惡。謂性無善惡，是謂人命無貴賤也。（《本性篇》）

他把人性分為三等：人性善者為上（中人以上者），人性惡者為下（中人以下者），人性善惡混者為中（中人也）。王充從元氣自然論出發，認為人性的上中下之差是很自然出現的，如同「九州田土之性，善惡不均，故有黃赤黑之別，上中下之差；水潦不同，故有清濁之流，東西南北之趨」一樣。王充指出：

人之善惡，共一元氣。氣有少多，故有賢愚。（《率性篇》）

王充認為，人性是稟受元氣自然生成的，稟氣之厚薄決定了人性之善惡，所謂「稟氣有厚泊，故性有善